

docsriver.com
商家本本店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史傳類

99

梁慶寅釋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牟子理惑論





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

99

梁慶寅釋譯

星雲大師總監修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總序

自讀首楞嚴，從此不啻人間糟糠味；
認識華嚴經，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。

誠然，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，苦海之寶筏，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，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闍藏慕道，頂戴感恩的心情！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，古文艱澀，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，望而生畏之憾，因此多少年來，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，以使法雨均霑，普利十方。

一九九一年，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，是年，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「白話佛經編纂會議」，將該套叢書訂名爲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。後來幾經集思廣義，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：

一、啓發思想：全套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共計百餘冊，依大乘、小乘、禪、淨、密等性質編號排序，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：

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

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

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

二、通順易懂：每冊書均設有譯文、原典、注釋等單元，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，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，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，契入妙諦。

三、精簡義賅：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，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，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，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。

四、雅俗共賞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是白話佛典，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，以達到雅俗共賞、三根普被的效果，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、源流、解說等章節，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、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。

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，諸方賢聖齊來慶祝，歷經五載、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也於此時隆重推出，可謂意義非凡，論其成就，

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：

一、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：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，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，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。有鑑於此，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突破窠臼，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，作有系統的整理，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！

二、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、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，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，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，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。

三、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，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，藉此銜接兩岸佛學，使有互動的因緣。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，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，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。

四、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：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、啓發性、教育性、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，有別於坊間一般「照本翻譯」的白話佛

典，使讀者能充份享受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」的法喜。

今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付梓在即，吾欣然爲之作序，並藉此感謝慈惠、依空等人百忙之中，指導編修；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，穿針引線；以及王志遠、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；劉國香、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；滿濟、永應等「寶藏小組」人員的匯編印行。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，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，功竟圓成！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、全力以赴的鉅作，但經義深邃，實難備盡；法海浩瀚，亦恐有遺珠之憾；加以時代之動亂，文化之激盪，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，或有差距之處。凡此失漏必然甚多，星雲謹以愚誠，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，是所至禱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

編序

敲門處處有人應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是佛光山繼《佛光大藏經》之後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，以將傳統《大藏經》菁華化、白話化、現代化為宗旨，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，以通俗親切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。

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，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，各種文化、教育事業蓬勃創辦，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，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。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，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。從開始構想、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，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，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，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，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。

這是一套多層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，取其菁華，捨其艱澀，希望既能將《大藏經》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，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。我們祈望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具有四種功用：

一、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——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，一套《大藏經》就有九千餘卷，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，既不失《大藏經》的法味，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，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，以捨棄龐雜的枝節。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，其間難免有所缺失，謹請十方仁者鑒諒。

二、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——現代人離古愈遠，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，往往視《大藏經》為艱澀難懂之天書，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，亦只能望洋興歎，欲渡無舟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，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，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。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，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，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，兩全為難。

三、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——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可以深入，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，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，不易尋覓捷徑。《寶藏》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，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，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，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。然而大陸佛教經「文化大革命」中斷了數十年，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，《寶藏》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，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，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，不易滌除積習，若有未盡中肯之辭，則是編者無奈之咎，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。

四、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——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，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，可惜經文古奧，缺乏現代化傳播，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，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？如何普濟僧俗兩眾？我們希望《寶藏》是百粒芥子，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，使讀者由淺入深，略窺三昧法要。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，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，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，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。

在《寶藏》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，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——一是將文革浩劫斷

滅將盡的中國佛敎命脈喚醒復甦，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、中、青三代佛敎學者之生活生機。大師護持中國佛敎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，印證在《寶藏》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，是《寶藏》的一個殊勝意義。

謹呈獻這百冊《中國佛敎經典寶藏》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，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。至誠感謝三寶加被，龍天護持，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，惟願《寶藏》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，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，普濟世界人民衆生！

目錄

● 題解	一
● 經典	二
● 源流	二九
● 解說	三三
● 附錄	六三
● 參考書目	五九



題

解

《牟子理惑論》通稱《牟子》，又叫《理惑論》。唐朝僧人神清在《北山錄》中說，該書原名為《治惑》，後來唐代人爲避唐高宗李治的諱，才改成《理惑》。可是書裏還有其他地方用到「治」字卻並未改動，可見由唐人避諱改名的說法並不可靠。

《牟子理惑論》是中國最早的佛教論書。全書正文三十七章，正文前有牟子的傳記作爲「序」，書末有「跋」。作者自設賓主，以問者和牟子各爲一方，採用對話問答的形式展開論說。問者對佛教提出種種疑問和責難，牟子引經據典，逐一加以解釋或辯駁。在一問一答之間闡述了佛教的義理。問者提出的問題代表了當時的人對佛教的困惑，牟子的答辯則代表了信徒對佛教的理解。因此，《理惑論》一書從兩個側面反映了那時候的中國人對佛教的認識。作爲中國人論述佛教的早期著作，《理惑論》是了解佛教初傳中國的情況，研究中國佛教形成和發展的一部重要文獻。

版本

《理惑論》最初收在陸澄的《法論》中，稱爲《牟子》。陸澄是劉宋、南齊時候的人，受宋明帝委託編《法論》以弘揚佛教。陸澄因《理惑論》中講了「漢明帝遣使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「求法」的故事，就把它編在講佛教緣起的「緣序」集中。《法論》在早年既已失傳，僅在《出三藏記集》裏保存了目錄。

《出三藏記集》的作者是南朝齊梁時候的僧人僧祐，在他的另一著作《弘明集》裏收入了《理惑論》的全文。因此，通常就說《理惑論》首載於《弘明集》。《弘明集》通行的刻本大致是兩種，一個是明代汪道昆刻本（有的學者說應是吳惟明刻本），另一個是金陵刻本。《理惑論》隨著《弘明集》的刊刻而流傳。其他叢書收錄《理惑論》時，也都是以《弘明集》為本的。

還有一些典籍對《理惑論》有所記載和收錄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在「子部·儒家類」的目錄中記有《牟子》二卷，但是不見原文。新、舊《唐書》跟著作了同樣的記錄。南朝梁人劉孝標注《世說新語》，唐代人李善注《昭明文選》，各引《理惑論》正文內容一則。宋朝太平興國年間撰《太平御覽》，引《理惑論》五則。清朝光緒年間彙刊《百子全書》，錄有《牟子》一卷，全文錄出。清人孫星衍編《平津館叢書》，也全文收入《理惑論》。

作者

在《出三藏記集》所保存的《法論》目錄中，只是《理惑論》書名之下標有一個副題：「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」，並沒有確指作者的名字，而到了《隋書》裏，則說《牟子》二卷，「漢太尉牟融撰」。新、舊《唐書》沿用了這一說法。在《出三藏記集》所列的《弘明集》目錄中，沒有說《理惑論》的作者是牟融，但是在明代的《弘明集》刻本中，則又注明《理惑論》的作者是「漢牟融」，同時附注「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」。孫星衍把《理惑論》收入《平津館叢書》時，曾讓他的學生洪頤煊考校作者。洪頤煊認為《理惑論》不會是牟融所作，牟子博是什麼人又不見歷史記載，無從考證。然而在《平津館叢書》中仍然保留了「漢太尉牟融撰」的說法。據洪頤煊解釋，這是因襲隋唐舊說，「以疑傳疑」。

由於《理惑論》的作者有不同說法，因而牟子是什麼人就成了問題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。

《理惑論》的作者不是漢太尉牟融，這是已經清楚的了。牟融是東漢初年明帝、

章帝時候的人，《後漢書》中有他的傳記。他任太尉是在章帝即位之後，死於建初四年（公元七九年）。歷史上並沒有他曾經著書的記載，特別是根據《理惑論》的序傳，牟子是東漢末年靈帝、獻帝時候的人，獻帝即位時已經是公元一九〇年，距牟融在世相去一百多年。可見這個牟子斷不會是那個做過太尉的牟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現在從《弘明集》裏所看到的是，《理惑論》的作者為「漢牟融」。並不再冠以「太尉」二字。這僅僅是為了方便而省去，還是另有一個不會做過太尉的牟融呢？確有學者認為，另有牟融其人並非不可能，但是因缺乏史料的支持，只好存疑了。

《法論》和《弘明集》，在《理惑論》的書名下都標注了「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」的副題。這是關於《理惑論》作者的又一種說法。這個副題引出了更多的爭議，致使眾說不一。擇其要者就有：

其一、牟子姓牟名博，而《理惑論》則是記傳體的書。

其二、懷疑「牟子博傳」中的「博」字是「傳」字的誤筆，後來補寫傳字時忘記圈去。但是「牟子傳」是書名而非人名，並且是蒼梧太守撰寫了《牟子傳》。於是，

說《理惑論》是牟子的自傳不對，說《理惑論》的作者是牟子博也不對，說牟子是蒼梧太守更加不對。

其三、牟子姓牟名融，字子博。但是這個牟融不是漢太尉牟融，而是漢末逸士。其四、牟子已失其名，他是蒼梧人，但是不曾做過太守。

爭論表明，牟子叫什麼名字，到底是什麼人，已經難以確考。不過從《理惑論》的序傳中還是可以對他有個大概的了解：牟子的原籍是蒼梧，他精通儒家經典，博覽諸子百家的著作，為避開社會動亂來到交趾。他沒有做過蒼梧太守，並且無意於仕途。他志在鑽研學問，潛心研究佛教和《老子》。因他信奉佛教，遭到世俗的非難，於是寫下了《理惑論》進行答辯，也藉以宣揚佛教原理。

成書年代

對作者的看法不同，勢必導致對成書年代的不同意見，這就又有《理惑論》一書的真偽之辯。

梁啟超、呂澂諸公認為《理惑論》乃是偽作，作者是晉宋時候的人，不會是後漢

人士。梁啓超先生著有《牟子理惑論辨僞》一文，批評《理惑論》內容既僞，文字也壞。他從內容方面指出：

第一、《理惑論》中有「僕嘗遊于闐之國」這樣的話，可是根據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的記載，由於于闐發生變亂，漢桓帝討伐不了，所以從那以後于闐與中國已經斷絕了交通，稍後的靈帝和獻帝時候的人又怎麼可能到過于闐呢？

第二、《理惑論》中講了當時的沙門剃頭、好酒、畜養妻子等情況，表明當時僧徒的風紀已經相當敗壞，在漢末不會有這種情況，在東晉的後趙、後秦時才有這種現象。

第三、《理惑論》中又說，當時的「世人學士」，「多譏毀佛法」，但是從保存下來的後漢人的著述來看，除了襄楷給漢桓帝的上書中提到佛法以外，沒有其他人再提到佛法。這表明漢代的士大夫並不知道有佛學。既然不知道，又怎能有毀譽？顯然這是僞作者把東晉、劉宋時的情況說出來了。

梁啓超先生還提出一些其他論據說明《理惑論》是僞作。他並且從文字方面批評說：「此書文體，一望而知為兩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。」總之，他否定牟子

真有其人，認為《理惑論》是東晉、劉宋之間的人偽託後漢牟融的名字撰寫的。

呂澂先生在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一書中也指出：《理惑論》的作者決非漢末時人，當時佛家的學說不會有書內記載的情況。此書的成書時間約在晉宋之間，應該屬於偽作。呂澂先生著重從佛學方面加以論證，例如：《理惑論》正文第一章講了佛的生平，其中說，佛在十九歲時騎上犍陟，帶上車匿，在鬼神的扶舉之下飛出宮去，這是對佛出家情況的描寫。但是佛十九歲出家這一說法，就與當時一般所說的二十九歲出家不一樣。十九歲出家一說，只見於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而這部經是在三國時候，由當時在吳國的支謙翻譯出來的，這豈不意味著《理惑論》的成書是在吳代以後。又如書裏記載的須大拏故事，出自《六度集經》，它的翻譯者也是三國時的吳國人，同樣是後來的事了。

牟子自稱是漢獻帝時候的人，生活在二世紀末。而這兩部經的譯出都在三世紀中葉，相差五、六十年。或許可以說，牟子長壽，《理惑論》是他在晚年寫的，這樣說儘管可疑，還勉強說得過去。然而仍然有問題，書中說佛在二月十五日涅槃，與一般所說的二月八日或四月八日涅槃也不一樣。特別是書裏還講到「佛道以酒肉爲上

戒」，這種說法只是在《大涅槃經》被譯出以後才有的，而這部經被翻譯出來，已經是晚在五世紀初了。這些材料都說明，《理惑論》成書的時間不會早於晉代，應是在晉宋之間。

胡適之、周叔迦、湯用彤、任繼愈諸公則認為，《理惑論》不是偽作，確是漢魏舊帙。胡適之先生認為梁啓超的辨偽「未免太粗心」。他在《論牟子理惑論·寄周叔迦先生》一文中說：《理惑論》文字明暢謹嚴，在漢魏之間算得上是好文學。

周叔迦先生在《梁任公牟子辨偽之商榷》一文中，對梁啓超提出的論據進行分析，詳細論證《理惑論》確非偽作。他指出，于闐與中國在漢桓帝以後斷絕交通，是指朝貢的使者不再來往了，並不是連私人的遊歷也都被禁絕了。因此靈帝、獻帝時有人遊于闐並不奇怪。其次，根據漢魏政府不准漢人出家，而說當時不會有中國人成為沙門，也不準確。漢末有臨淮（今安徽靈璧縣）人嚴佛調就出家做了沙門。從《後漢書》中又可以了解到，楚王劉英曾經供養過沙門。還有笮融當時已經大起佛寺，怎麼會有了佛寺卻沒有沙門呢？至於當時沙門剃頭髮、好酒漿、畜妻子，也是可以得到解釋的，因為那時佛教的戒條還沒有傳入中國，沙門沒有戒律可以遵行，飲酒、畜妻就

不足爲怪了。到了東晉時，戒律已經嚴整，那時倒不會普遍地出現這種現象了。

再次，《理惑論》中說當時的世人學士多譏毀佛法，恰能說明後漢著述中很少提到佛法這一現象。因爲學士們既然輕視佛法，也就不願意把它著錄在簡冊中了。反觀晉宋之際，玄風暢行，士大夫都願意與高僧交遊，乃至捐出宅院作爲寺廟，又怎麼會譏毀佛法呢？說譏毀佛法是晉宋時候的情況也是不準確的。總之，在周叔迦先生看來，梁啓超的質疑多不確實，《理惑論》是漢人著作應是沒有問題的。認爲《理惑論》不是僞作的學者特別強調，該書序文中所記載的歷史事件，不但與史書符合，而且可以補充正史之闕。

湯用彤先生在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中就此指出：《理惑論》序文中說，豫章太守是交州牧（刺史）的弟弟，爲中郎將笮融所殺，交州牧派遣騎都尉劉彥領兵討伐，這些敘述歷歷與正史相符合。根據《後漢書·朱嵩傳》：朱嵩是會稽上虞人，他有兒子名朱皓，曾官至豫章太守。根據《陶謙傳》：笮融殺死了豫章太守朱皓。根據《吳志·士燮傳》：交州刺史朱符被夷賊所殺。又據《薛綜傳》：朱符任交州刺史時，多任用會稽同鄉，其中就有劉彥。

綜合這些史料可以看出：朱皓、朱符、劉彥都是會稽人；朱皓是朱儁的兒子，朱符是朱儁的子侄；笮融所殺的豫章太守朱皓，就是交州牧朱符的弟弟。因朱皓之死，朱符派遣劉彥將兵赴弟之難。這不僅表明《理惑論》序文所述與歷史契合，而且補充了一些史書的漏載材料。因而，《理惑論》不是偽作，由此可得確證。

論證此書不偽的理由還有：序傳中說牟子避亂到交州居住，並記載了交州當時的學術情況，這也是可信的。交州當時成爲內地的避亂之地，由於提倡文教，北方許多學人來此避難，相互交流學術是有條件的。又如《理惑論》中只講「黃老」而不講「老莊」，這種提法和口吻也是後漢以前所使用的，不似後人的語氣，只是到了魏晉玄學興起，莊子才被推崇而與老子並提。

再如道家與道教不一樣，最初道家與神仙家也有區別，後來才合而爲一。《理惑論》中對它們的區別就很嚴格。至於細小之處就更多了，例如書中用到「莊」字的地方均改用「嚴」字，就是爲了避漢明帝劉莊的諱。凡此種種，都可說明《理惑論》成書於東漢末年，並非後人偽託之作。

《理惑論》是成書於東漢末年，還是晉宋年間的偽作，在日本和法國學者中也有

不同的議論。這一波及中外的真偽之訟，至今尚無定論。從各家的辯論發言中可以發現，說它是偽書的學者，所持的論據多與佛家有關，其論證多是指出書中所用的佛教材料頗可懷疑。而說它不是偽書的學者，大多是根據書中敘述的歷史事件與史書相符。由於論者均持之有故，因而取捨就主要在於看問題的角度了。考慮到《理惑論》序傳中所述的史事可與史書相印證，對社會動亂狀況和交州學術氛圍的記述與當時的實際相符，關於撰寫此書原因的交待，也與當時佛教在中國的背景契合，因此，《理惑論》成書於漢魏之際應是可信的。

學術價值

有學者評價說，《理惑論》三十七章，實為佛教的重要著作，在中國佛教史上是重要的一頁（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上冊，《湯用彤論著集之一》第五十六頁、五十七頁）。認為《理惑論》是真書的學者，一般都對它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學術價值作出肯定的評價。

從現存的材料看，《理惑論》最初受到重視，主要是因為書中講述了「明帝求法」

的故事。正文第二十一章說，漢明帝夢見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飛在殿前。有人告訴明帝，這個神人就是天竺國的得道者，號稱爲佛。於是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。漢地聽說佛道即由此發端。這一記述，引起古代學者的格外注意。陸澄編《法論》，不把《牟子》歸列教門，而是編入講佛教緣起的集子中，就是考慮到書中有「漢明帝時佛教初傳中國」的記載。劉孝標注《世說》，李善注《文選》，從《理惑論》中引用的也都是這一條。《理惑論》是中國早期的佛教論著，其中出現佛教初傳的記載自然十分觸目。

關於佛教何時傳入中土的問題，說法有多種，難以確定。當代學者一般是把佛教初傳上推到西漢末年，認爲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公元前二年），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廬口授佛經是最初的傳入，而不以「明帝求法」爲最早，對明帝求法本身也提出了質疑。明帝求法一事，《後漢書》中是有記載的，歷來是流行最廣的一種說法。《理惑論》中講到這件事時，包含了「夢見神人」一類的虛構成分，不足全信。

但是正如湯用彤先生所說：「求法故事，雖有疑問，但歷史上事常附有可疑傳說，傳說固妄，然事實不必即須根本推翻。」（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上冊，《湯用

形論著集之一》第十六頁）就是不能因為求法故事中附會了一些神怪傳說，就把它完全看成向壁虛構的產物。如果把佛教的初傳加以略為寬泛的理解，不是看作一件事，而是看作幾件事；不是看作某一個時間，而是看作經歷了一定時期的過程，那麼《理惑論》所記述的初傳故事，應是這個過程中一個影響最大的舉動。

即使對明帝求法存疑，《理惑論》記載了這件事仍然是有價值的。它表明，在車子所處的那個時代，人們仍然認為，佛教是通過漢明帝遣使求法而傳入中國的，而其中提到使者赴大月氏抄寫佛經四十二章，又為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傳入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說明材料。以往認為這部經是由印度僧人翻譯過來的，自《理惑論》開始，又有了由使者抄寫回來的說法。

车子撰寫《理惑論》，旨在宣講佛教的教義，並不以介紹佛教的初傳為主要目的。因此，當代學者認為，《理惑論》對於了解佛教初傳的情況，以及對於研究中國佛教的形式和發展具有重要價值，不僅僅在於它記述了一個初傳故事，而主要是在於它的整體內容反映了佛教初傳時期的狀況，體現了當時的中國在佛教傳布和研究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時代精神。

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在漢代至魏晉這一時期，大致經歷了以下一些變化：在兩漢之際，人們是把佛教與道家學說並列在一起的。佛教講「清靜」，黃帝和老子的道家學說講「無為」，由於清靜與無為聲氣相通，因此人們認為佛教和黃老之學沒有多大差別。於是就出現了佛教學說與黃老之學並重、佛與黃老並稱的狀況。

佛教在來華之初，主要是在皇族和上層貴族中間流行，根據史書的記載，當時的皇族和貴族都是把佛教和黃老之學等同看待的，同時也就把佛和黃帝、老子看作同樣的神。《後漢書》中說，漢光武帝的兒子楚王劉英，「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」。「浮屠」就是佛，「祠」就是建造祭壇作祭祀。這句話就是說劉英把佛和黃帝、老子作為同樣的崇敬對象，並且把佛教學說與黃老學說等量齊觀。到了漢桓帝時，更進而在宮中設立華麗的祠壇，把佛像和黃帝、老子的像並列在一起祠祀。由於漢桓帝事情做得鋪張，引得大臣襄楷上書勸諫。襄楷說，佛教崇尚清虛和無為，主張寡欲而反對奢華，大肆鋪張地祠祀，恰恰違背了它的宗旨。從襄楷這番話可以看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佛教和黃老學說也是沒有差別的。

與此同時，漢代皇族上流社會在對待佛教的態度上又表現出另一個特點，就是又

把佛教和神仙方術相並列，使佛教成爲依附於方術的一種教流。原本是道家學說的黃老之學，到了後漢時候，已經被方士們接過去了。道家方士們把老子引爲道教的鼻祖，把黃老之學篡改成了以神仙辟穀爲內容的道術，與神仙方術混在了一起。由於黃老學說發生了向道術的演變，在皇族和貴族普遍信奉鬼神方術的背景下，佛教也就在所難免地成了道術的依附品。

據史書記載，東漢皇家多「好鬼神事」，即使是光武帝和漢明帝，雖然是一代明君，也一樣地相信讖諱神怪之說。於是，在皇族和貴族的眼裏，佛教也是神仙方術的一種，他們信奉佛教，也只不過是把它當作一種神仙道術來看待的。

概言之，漢代的皇家貴族認爲「清靜」與「無爲」相通，從而在教理上把佛教與黃老之學並稱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又把佛看成與老子一樣的神仙，從而又把佛教與神仙道術相並列。

到了東漢末年，情況起了一些變化。這一變化的特點是，佛已經有了被單獨供奉的際遇，而不再與黃老並稱了。「笮融事佛」一事是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標誌。據《後漢書》和《三國志》說，笮融大造佛寺，用銅鑄造佛像，塗上金色，披上彩衣。並且

誦讀佛經，紀念佛教的宗教節日，規模相當可觀。笮融的事佛，已經是僅僅祀佛，而不兼及黃老了。與以往的佛與黃老並重相比，另成一種風氣。

到了魏晉年代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，以及人們對佛教的態度再一次發生了轉折。主要表現為：神仙道術已經衰微了，不再被相信；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；佛教得以擺脫神仙方術，在依傍玄學又補充玄學的過程中進一步流傳。魏晉時期，在何晏、王弼等玄學家的帶動下，談「有」說「無」成爲社會的時尚。正像《晉書·王衍傳》所說的那樣：「何晏、王弼立論，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」。這種社會思潮對佛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

東漢末僧人支讖和三國時佛經翻譯家支謙說：佛教所講的「涅槃」、「眞如」和「空」，與老莊玄學所說的「道」和「無」沒有什麼區別，玄學對佛教的滲透於此可見一斑。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，佛徒名僧大多兼通玄理、談論虛玄，樂此不疲。正如湯用彤先生所作的概括：魏晉佛學，在所讀的書籍、行事的風格，乃至使用的名詞術語方面，都和玄學家沒有多大差別。在思想理論方面，也是佛教與玄學互相印證，遙相呼應。

從漢代佛教與黃老並稱、與神仙道術並列，到漢末推崇佛教而不兼及黃老，進而到魏晉時候，佛教擺脫了神仙道術，開始與老莊玄學互相唱和，這個變化過程以及各個階段所呈現出來的時代特徵，在《理惑論》中都有所反映，或者有所預示。《理惑論》一書也由此表現出它特有的時代精神。

牟子說：「道有九十六種，至於尊大，莫尙佛道。」又說：「衆道叢殘，澹泊無爲，莫尙於佛。」類似的議論，正是漢末時候推重佛教的反映。

牟子說：「辟穀之法，數千百術，行之無效，爲之無徵。」在序傳中又交待說：「雖讀神仙不死之書，抑而不信，以爲虛誕。」這又是神仙道術已不再被相信，佛教開始擺脫道術的反映。

牟子說：「佛與老子，志在無爲。」又說他自己是「睹佛經之說，覽老子之要，守恬憺之性，觀無爲之行」。在序傳中則自稱「銳志於佛道，兼研《老子五千文》」。再結合牟子在書中大量引用《老子》，兼而引用《莊子》的情況，不難看出，《理惑論》一書在推重佛教的同時，已經預示著「漢代佛教附庸方術」向「魏晉釋子雅尙老莊」的轉變。爲這一風氣的轉變作了鋪墊。

上述分析表明：在漢代佛教向魏晉佛教發展演變的過程中，牟子是一個承上啓下的過渡人物，而《理惑論》一書則是風氣轉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。這正是《理惑論》在中國佛教學說中所具有的價值，正是它在中國佛教史上所具有的地位。湯用彤先生說《理惑論》是佛教的重要著作，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頁。這一看法，確實是對《理惑論》一書的中肯評價。



譯文

牟子廣泛地閱讀儒家的經傳和其他各個學派的著作，無論是長卷還是短篇，沒有他不願意看的。儘管對兵法不感興趣，但是仍然閱讀兵書。雖然也看一些談論神仙不死的書，然而並不相信，認為那是虛幻荒誕之說。當時正值漢靈帝死後，天下紛亂，只有交州一帶還算安定。北方有奇特才能的人紛紛來到這裏，他們大多擅長神仙辟穀的法術。有許多人向他們學習辟穀的方法，牟子卻常常依據儒家的五經對他們提出詰難，那些道家術士們沒有人敢於應對，就像孟軻批評楊朱和墨翟，而楊朱和墨翟無法回答一樣。

在此之前，牟子是爲了避開社會動亂，奉母來到交趾的。二十六歲時回到蒼梧娶妻。蒼梧太守聽說他恪守儒學，就前往拜訪，請他出任官職。牟子那時正當壯年，志在鑽研學問，又目睹社會紛亂，因此無意做官，就沒有應允。當時，各州郡之間互相疑忌，斷絕了交往。太守因牟子博學多識，就委派他出使荊州。牟子認爲，榮譽和官爵容易推讓，但是使命難以推辭，於是就整理行裝準備出發。正碰上交州的州牧敬重

有才能的隱士，徵召牟子到州裏任職，牟子因此稱病不出。

州牧的弟弟是豫章太守，被中郎將笮融殺害。州牧派遣騎都尉劉彥領兵討伐笮融，由於怕引起沿途州郡的懷疑，軍隊不敢貿然進發。州牧爲此求助於牟子說：「我弟弟被逆賊所害，手足之死令人痛心疾首。打算派劉都尉領兵討賊，又擔心其他州郡產生懷疑出來阻擋，使軍隊無法通過。先生文武兼備，有獨立應對的辯才。現在想委屈你前往零陵、桂陽走一遭，向他們借用道路，爲軍隊打開通路，怎麼樣？」

牟子說：「被這方土地養育，在這裏受到知遇之恩已經很久了，有雄心壯志的人可以捨身忘死，我一定馳騁效力。」於是整裝欲發。可是正在這時他母親去世了，結果未能成行。日子久了，牟子也就打消了走仕途的念頭。由於他明辨通達，看透了時事，隨即悟出了自己的使命，認識到社會紛亂，不是自己顯露才華、施展抱負的時候。

爲此感嘆道：「老子拋棄對聖名和智術的追求，修身養性，保持純真。天下萬物都不能干擾他的志向、不能改變他的志趣，天子無法以他爲臣，諸侯無法以他爲友，所以才可貴呀！」於是牟子立志修習佛道，同時研究《老子五千文》，咀嚼玄妙的佛道如品美酒，對五經像彈琴一樣予以玩味。從而遭到世俗人士的指責，認爲他背離了

五經，轉向了異端。面對世人的非難，他想起而爭辯，但是那樣就不合乎佛道了。想要沈默，又不能聽之任之。於是牟子採取著書撰文的方式，引用聖賢的話來證明和解說佛道，書名就叫作《牟子理惑》。

原典

牟子既修經傳①諸子，書無大小，靡不好之。雖不樂兵法，然猶讀焉。雖讀神仙不死之書，抑而不信，以為虛誕。是時靈帝②崩後，天下擾亂，獨交州③差安。北方異人咸來在焉，多為神仙辟穀④長生之術。時人多有學者，牟子常以五經⑤難之，道家術士莫敢對焉。比之於孟軻⑥距楊朱⑦、墨翟⑧。

先是時，牟子將母避世交趾⑨，年二十六歸蒼梧⑩娶妻。太守聞其守學，謁請署吏。時年方盛，志精於學，又見世亂，無仕宦意，竟遂不就。是時，諸州郡相疑，隔塞不通。太守以其博學多識，使致敬荊州⑪。牟子以為，榮爵易讓，使命難辭，遂嚴當行。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，復稱疾不起。

牧弟為豫章⑫太守，為中郎將笮融所殺。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，恐外界相

疑，兵不得進。牧乃請牟子曰：「弟爲逆賊所害，骨肉之痛，憤發肝心。當遣劉都尉行，恐外界疑難，行人不通。君文武兼備，有專對才，今欲相屈之零陵^①、桂陽^②，假塗於通路，何如？」

牟子曰：「被秣伏櫪，見遇日久，烈士忘身，其必聘效。」遂嚴當發。會其母卒亡，遂不果行。久之退念，以辯達之故，輒見使命。方世擾攘，非顯己之秋也。

乃歎曰：「老子^③絕聖棄智，修身保真，萬物不干其志，天下不易其樂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故可貴也。」於是銳志於佛道，兼研《老子五千文》^④。含玄妙爲酒漿，翫五經爲琴簧。世俗之徒多非之者，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。欲爭則非道，欲默則不能，遂以筆墨之間，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，名曰《牟子理惑》云。

注釋

①經傳：舊稱儒家的重要代表著作爲「經」，稱解釋經文的書爲「傳」。後來人們把傳也稱作經。

②靈帝：即劉宏，東漢皇帝，公元一六八——一八九年在位。